

基督教与

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

杨天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基督教与

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

杨天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关宏

装帧设计:徐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杨天宏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01-005083-X

I.基… II.杨… III.知识分子-非基督教运动(1922)-中国
IV.D4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179 号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JIDUJIAO YU MINGUO ZHISHI FENZI

杨天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河北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01-005083-X/D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即使对于那些亲历过当时事变的至今依然健在的幸存者来说，也大多犹如依稀别梦，残存在记忆里的信实成分已经不多了。大革命时代的老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写回忆录，往往不得不依赖当时的文献资料，真正能够自己回忆出来的历史影像实属寥寥无几。岁月无情，它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抹掉人们记忆中的许多东西，不管它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会撩起苦痛之情的。然而，并非过去的一切都可以轻易忘怀。人们没有理由忘记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师友，没有理由忘记他人为自己作出的奉献，没有理由忘记使自己获得新生的特殊经历……。对于中国基督教而言，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是一次不应该从记忆中轻易抹去的异乎寻常的经历，应当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永志不忘。

中国没有宗教传统。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明确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弟子们则留下了“怪力乱神，圣人不语”的喻世名言，由此规范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自然缺乏反宗教的传统。在中国漫长曲折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反佛非耶之事屈指可数。中国基督教著名领袖谢扶雅在20个世纪20年代曾著文指出：“中国的民族根本精神，立基于实践伦理之上，稍有智识的

士女，向来对于宗教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加轻视。一方面，佛教、道教、回教等等，在最近数百年来，对于我国社会、文化、教育、思想各方面，也没有给予何种刺激或帮助，所以一般人既没有‘非’他，也没有‘是’他。真正明显的张起非宗教之旗帜，而作理性的批评与攻击者，自唐韩愈非佛教以后，怕要算最近两三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了。至于二十多年前的义和团和各种教案，那是排外，是‘扑清灭洋’，是由于盲目的冲动，不能算作有意识的非宗教运动。”^① 谢氏所言，就其指陈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以及非宗教运动的历史而论，无疑颇有见地。然而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唐代先贤的“反佛”与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精英的“非耶”实难同日而语。在唐代，真正从学理上与佛教辩难者，韩愈而外，不过李翱、姚崇、傅奕、吕才数人，寥若晨星。其传世之作，仅只韩愈《原道》、《谏佛骨表》两篇，余皆不足惊世骇俗，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非基督教运动则不然。19世纪以来，随着进化论及科学哲学的问世，一场以人文主义为宗旨的批判宗教神文化的运动在欧美勃然兴起，“上帝已死”成为惊天地、动鬼神的响亮口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续其流、衍其波，发展成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文化及政治运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的著名人物大多卷入其中，或赞同，或反对，是耶非耶，热闹非凡。留下论著之多，谓之汗牛充栋，实不为过。这场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影响的运动以不同于晚清历史上传统士绅发起的“反洋教”运动的姿态及运作方式出现，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也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运动尚存在简单否定基督教文化这一不足之处，运动参与者对人类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但运动中提出的思想命题无疑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

^① 谢扶雅：《近年来宗教及非宗教运动概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1928年版，第17页。

对于1922年至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教会人士和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早在事件尚未结束之时便开始了研究。近年来，港台及海外学者亦倾注大量心力，企图从新的角度和视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1980年，美籍华裔学者叶嘉焯出版了他的专著《宗教、民族主义与中国学生：1922—1927年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1988年，美国学者鲁珍晞（J.G.Lutz）教授出版了《中国政治与基督教差会》一书，^①专门讨论这一运动。差不多同时，台湾学者叶仁昌推出了他的《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思潮》，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拓展充实，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于1992年出版。这一系列论著，尽管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架起了一个起码的支点，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耐人寻味的是，当港台及海外掀起一阵又一阵研究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热潮之时，非基督教运动的故乡本土却一片沉寂。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一部以基督教这段不平凡经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杀青付梓，涉及这一事件的有关论著类皆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作者在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反复论证之后，认为尽管港台及海外学者对此作了研究，但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尚游刃有余。当然，由于缺乏对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研究，心中不免忐忑。经师友鼓励，于1991年下半年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殊不知竟获批准。这一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切断了作者为自己预留的后路，欲退不能，只得勉力为之。

但是，真正要从事严肃的历史研究谈何容易。操作伊始，作者就无可规避地碰上了如何认识评价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的问题。人

^① Ka-che Yip,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 - 1927*, Western Washington, 1980; J.G.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 - 28*,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Inc., 1988.

所共知，老一辈的学者往往是满怀革命热情从事其研究工作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余波尚存的年代，从事中国近代教会历史研究的学者，无不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角度来认识近代民教冲突，是非褒贬，大率以有利于反帝斗争为转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然而，在非基督教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是否仍然有必要在学术研究中表现这种政治倾向？作者从过去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以批判的实用主义为基调的著作中悟出了问题的答案：历史学家不能没有社会使命感，但历史学家应该而且也必须使自己有别于与历史事件利益攸关的当事人，有别于政治家。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往许多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功力不可谓不深，其著述殚精竭虑却未能让人真正信服者，正坐此病。惟有跳出历史事件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圈子，并不受现实的因素左右制约，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有可能。

为了避免走前人不得不走而今人却可以不走的弯路，动笔之前，作者确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与区别，要求自己去着意把握：一是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的联系与区别。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初起之时，陈独秀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问题，主张将两者区别对待。^① 这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人们所指陈的历史上基督教的罪孽大多乃教会所为。尽管有人认为没有教会，基督教将不复存在，但两者终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基督教的本质体现在它的教义之中，教义乃基督教的精神，虽然其中存在不少对宇宙、自然及人本身的超自然的神秘主义解释，但其核心内容乃是提倡人类之爱。而教会只是基督教赖以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仅犯了文化常识的错误，而且容易得出全然否定基督教文化的极端结论。二是近代基督教与中世纪基督教的联系与区别。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基督教也不例

^① 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独秀文存》第 1 卷，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第 659 页。

外。近代基督教是在原始基督教的基础上经过古代和中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教义教规，一脉相承，繁文缛节，代代沿袭，此层固不容否认。然而近代基督教毕竟有其近代色彩。自 16、17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便已开始脱下封建中世纪陈旧的晚礼服，着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时装。当然，此后基督教可以指责之处尚不在少，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即其明证。但是，基督教的变化发展并未终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基督教再次脱胎换骨。以 1897 年丹尼斯牧师 (Rev. James S. Dennis) 的 3 卷巨著《基督教差会与社会进步》一书的问世为标志，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在经历一次由旧时吸引异教徒或非教徒皈依上帝以免沦于地狱之苦到教会应成为传播人道主义的媒介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福音”及自由派神学崛起。^① 此时的基督教与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的基督教已形成不少重要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以凝固的眼光看待基督教及其传教事业，将不可能得出公允的结论。三是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联系与区别。一些传教士不承认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列强有某种联系，他们认为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反对以大暴小，以强凌弱，其教义便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排除基督教与外国列强存在联系的可能性。近代西方传教事业仰赖不平等条约而得以发展即可说明这一点。蒋梦麟尝言：“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② 所言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看成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组成部分，但言联系，不谈区别，也未必公正。近代以还，在反对中世纪封建神权政治的斗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倾向。世俗政治权力上升，神权受到排挤

① James S. Denni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897.

②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央日报社 1957 年版，第 4 页。

压制。政、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英、美、德、法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决定了传教士的使命不可能与列强政府的侵华使命完全一致。一些传教士可能成为列强侵华的开路先锋，另一些传教士则可能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友好使者，未可一概而论。

此意既明，对于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的评价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基础。这一基础包括了方法论的含义：在时间上，它是演变嬗递而非静止凝固的；在空间上，它是异构多维而非单一平面的；它既是对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有形历史的思考，又是对充满玄机、虚无缥缈、超现实的形上精神现象的探寻。基督教历史文化是复杂的，它有理由要求研究者不要用“线性思维”的简单方法来解释与它相关的一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世俗社会的历史可以草率从事。科学方法是无处不适的，对于研究包括非基督教运动在内的近代国人各种形式的反教运动，这种方法同样适用。采用这种方法从事研究，作者证实，至少相对近代官绅的反教运动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相对理性的以世俗人文化反对宗教神文化的运动，同时又是一场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反帝运动。尽管在这场运动中错觉误会有之，李代桃僵有之，偏激思想有之，过当行为有之，但是，在基督教尚未斩断其与不平等条约联系的前提下，在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尚未被科学真理与人文主义取代的条件下，非基督教运动自然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作者对于基督教及非基督教运动的认识评价并非主观臆断的结果。几乎整整3年，为搜寻资料，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费尽了气力，绞尽了心机。作者永远忘不了1993年新年前后孤身一人在北京度过的那段日子，忘不了北京大学旧期刊室外朝着自己凄楚哀号的寒鸦，忘不了近代史研究所地下旅馆卧室中那扇酷似牢房小窗的一尺见方的通气孔，忘不了每天清晨伫立在北京街头和着北风吞下的那一碗碗兰州拉面，忘不了……。现在，《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一书总算炮制出来了。高兴之余，却又不免忧虑。一是因未能穷尽史料，

心中不甚踏实。二是为书的命运担忧。书写出来总是给人看的，但时下愿意翻阅学术著作的读者能有几何？“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若得二三志同道合之人闲中读它几页，或点头称是，或摇头说非，俾作者能有新的创获，则私心以为最大满足。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晚清反教运动的历史回顾	1
第一节 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2
第二节 清季民教冲突原因分析	10
第三节 非理性化反教运动析例	25
第四节 晚清反教运动中的理性萌芽	32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酝酿 (1915年—1921年)	42
第一节 从“反孔”到“非耶”的逻辑发展	43
第二节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宗教问题讨论	58
第三节 由学术讨论向政治运动转化的倾向	77
第四节 教会传教事业的激剧变化	84
第五节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的召开	99
第三章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及其社会反响 (1922年3月—6月)	105
第一节 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到非宗教大同盟	105
第二节 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	118
第三节 北大五教授宣言与“信教自由”论战	137
第四节 教会方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	157
第五节 学生亚文化与反教浪潮的起落	177

第四章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1924年5月—1925年4月)	188
第一节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背景	189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学潮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205
第三节 教育家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221
第四节 非基督教同盟的重建及其活动	235
第五节 政党与非基督教运动	249
第六节 教会方面的复杂反应	268

第五章 民族主义全面高涨与基督教面临的新挑战

(1925年5月—1927年4月)	277
第一节 五卅运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	277
第二节 非基督教运动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发展	287
第三节 中国基督徒卷入“反教”运动	305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升级	318
第五节 军阀、外国人与非基督教运动	354
第六节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与非基督教运动的终止	366

第六章 余 论

第一节 非基督教运动与近代“教案”之比较	374
第二节 反教运动与基督教的“本色化”	383

附录一：基督教与非基督教运动大事记

中文部分	412
外文部分	426

后 记

	432
--	-----

第一章

晚清反教运动的历史回顾

1922年春，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卷入其中。他们创立非基督教同盟，撰写文论，发表演说，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宗教批判热潮。1924年以后，国共合作形成，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非基督教运动逐渐“政治化”，演变成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基本内涵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进行了6年，在此期间，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受到义和团运动以来最为猛烈的冲击。日本学者山本条太郎在《远东季刊》上著文指出：“在1949年共产党获取大陆中国前半个世纪，中国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两次运动都引发了东、西方冲突以及中国人反对外来文化的严重危机。”^①这位日本学者把非基督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意在强调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其实，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以及所产生的作用影响都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比拟。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中国下层民众对外国列强侵略的郁愤情绪的爆发，多少带有学者指陈的“盲目排外”的色彩。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一次中国知识界人士对西方宗教

^① Tatsuro and Sumiko, Yamamo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Far Eastern Quarterly* (Hereafter FEQ), XII (1953), p. 133.

文化的相对理性的批判，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宗教信仰、教育科技乃至中外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共和国制度业已建立、“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界还要发动一场反对基督教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与近代历史上中国民众持续开展的反洋教运动有没有渊源关系？其现实依据究竟何在？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以及晚清历史上的反洋教运动作一粗略回顾。

第一节 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基督教是公元1世纪时脱胎于犹太教的一门宗教。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该教在原有教派的基础上形成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派系，在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又产生了新教等众多派别。基督教派中最早传入中国的是聂斯脱利派，这一教派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景教”。大约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该教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传入中国。后因武宗灭佛，殃及景教，传入中国的这一基督教教派很快在中原销声匿迹。^①13世纪中叶，教皇伊诺森特四世派方济格教士卡皮诺前往和林，企图使大可汗贵由皈依天主教，结果败兴西归。元朝建立后，教皇多次遣使来华，中国领洗之人日渐增多。不过当时奉教者几乎都是被称为“色目人”的少数民族，尚未发现汉人奉教。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元朝统治倾覆之时，天主教也就随之衰落。

天主教在中国的冷遇曾一度因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利玛窦谙习中文，尊重中国传统礼教，采取交结权贵、传习科学的办法，在中国获得立足之地。他留居中国期间，积极传教，施洗人数多达4千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都受其影响，成为耶稣信徒。但好景不长，清初“礼仪之争”发生，耶稣会就天主教是

^① 冯承钧：《景教碑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70页。

否应该“中国化”与多明我、方济格等会发生的争执被诉诸教廷，教皇就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发出“禁约”，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康熙帝盛怒之下，谕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

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1813年到达中国，开始从事《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与《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经过多年努力，马礼逊完成了这两项艰巨的文化工程。1823年，《旧约全书》连同早已译成并发行的《新约全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同年，《英华字典》6卷也全部出齐。马礼逊不仅是第一位来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而且是第一个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人。然而，使他抱憾终生的是，尽管他一直为之竭尽全力，直到1834年因病离开人世，他都未能实现其进入中国内地的愿望，他所推进的事业当然也没能随之进入中国内地。在马礼逊之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如裨治文、郭实腊、卫三畏和伯驾等人，虽然无时不在祈祷，“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①并为此积极努力，但是，直到鸦片战争战火燃起，他们都未能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开局面。

鸦片战争之后，形势丕变。1842年清军在战争中败北，清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与英国方面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久美、法接踵效尤，分别与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1846), pp. 108—106.

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①后因法国使臣刺尊尼提出要求，耆英奏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不久又提出发还雍正年间查封的天主教堂旧址，均获照准。清政府在传教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让步，使外国传教士兴奋异常，把它看作是“传教史上划时代的新标志”，^②认为“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的路总算打开了”。^③

其实，近代第一批中外条约为传教事业开拓的道路仍然十分狭窄，传教士进一步拓宽将中国引向“彼岸世界”的道路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天津条约》，将自由传教的规定更加明确地写进双边条约。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传教宽容”政策。尽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真正改变了对传教事业的成见，但客观上却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大刺激了他们传播“上帝福音”的热情。1858年7月30日，传教士杨笃信写信给伦敦差会，报告刚刚签订的《天津条约》可能对教会事业产生的影响：

就这样，中国差不多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受到我们控制。每个已经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及其国内差会，如果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将是一种罪过。^④

也许是为了避免“获罪”，战争一结束，在华各基督教教派便各显神通，迅速掀起一场以“十字架征服中国”为目的的传教运动。

外国教会首先在中国划分教区，发展教会组织。以天主教为例。从1846年起，天主教已陆续在澳门、南京、北京设置了3个主教区，在香港、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等地设置了代牧主教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54—62页。

②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p. 231—232.

③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④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London 1908, p. 82.

区。1879年，教皇里欧13世将中国划为五大教区，分别任命教区主教，实施管辖。^①新教欧美各差会也满怀热情，派遣传教士赴华活动。新教具有资本主义色彩，但该教内部派别林立，各自为政。19世纪来华活动的主要有路德宗、长老宗、浸礼宗、公理宗、监理宗、圣公宗等宗派所属各教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信义会、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浸礼会、福音会、美以美会、循理会等。为了协调动作，推进共同事业，1877年和1890年，新教传教士曾先后两次在华召开各派联合举行的全体会议，对如何在华开展传教活动问题取得一些共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随着在华教会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传教士的栖息场所教堂在中国城乡大量涌现。以安徽为例，据各府、州、县“册报”，1908年安徽各州县共有大小教堂408所，其中宣城最多，达37所，其次是芜湖县，有23所。53个册报州县，平均每个19所，就连僻处大别山中的霍山县，也有教堂11所。^②如果说安徽地处中国东部，且得长江通航之便，那不妨看看边疆省份云南的情况。据《中华基督教年鉴》等资料记载，从1881年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在大理建立第一座教堂、次年内地会在昆明建立总堂以后，云南各地很快教堂密布。截至清末，全省已有10个县建立了基督教教堂，1917年扩大到17个县，到1919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在云南兴建的教堂已多达128座。^③在比邻云南的四川，教堂的增加也“有似雨后春笋”，“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④19世纪末，仅重庆一个地

① 《圣教杂志》第18年第7期，第4页；第13年第7期，第15页。五大教区划分如次：第一区为直隶、辽宁、蒙古；第二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两湖、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为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第五区为两广、福建、香港。

② 冯煦：《皖政辑要》，安徽省图书馆藏。

③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23年版。

④ 梧生：《排外与仇教》，《四川》第1期，1907年12月。